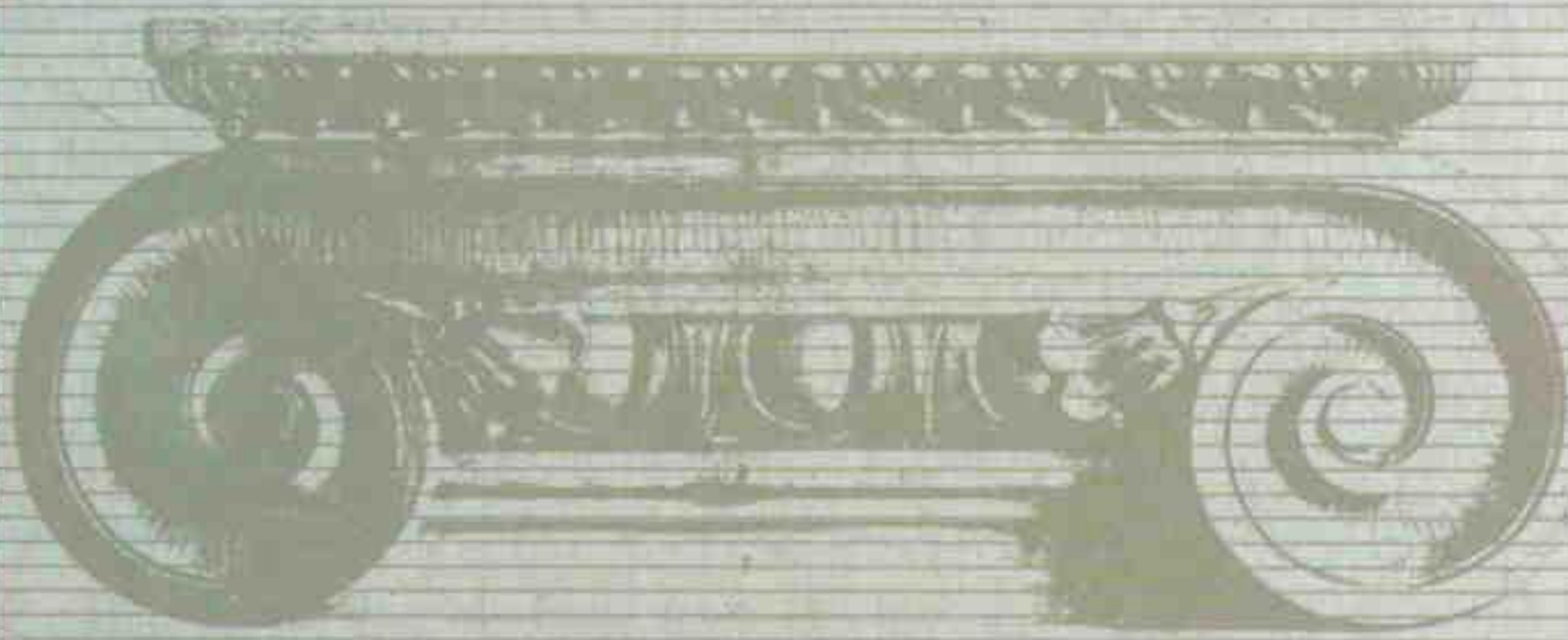
JURENZISHU

巨人自述



密特朗自述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

ZW.JC
2003
K835.65
10

·巨人自述·

法兰西传奇

——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生前自述

张明林　主编

國家圖書館藏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3 0731 1498 9

CHINA

目　录

卷一　从战俘营到戴高乐的反对势力 ……（1）

卷二　1981 年 5 月的选举：

源自外国的反应 ……（169）

附录　密特朗传记 ……（190）

CHINA

CHINA

卷一　从战俘营到戴高乐的反对势力

一、战俘营时期和逃亡时期

乔治－马克·贝纳穆问：从您的著作和言谈中深知，您的社会生活好像是在“奇怪的战争”和法国战败时开始的。您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受伤然后被德国人俘虏的呢？

弗朗索瓦·密特朗答：我那时属于殖民地步兵，这支部队和外籍军团夜以继日地轮流守卫，以牵制德军。德军在突破色当后突然转向洛林。我们是从阿登省的斯特尼出发，6月3日抵达位于莫尔多姆附近、凡尔登前面的著名的304高地。站在默兹省的高地上，我们注视着德军的突击部队穿着短裤衬衣，在广阔的平原上摆开阵势。平原的远处是隼山。我们背着20至30公斤的行囊，腿上打着绑带。

夜幕降临，万籁俱寂。我们的排长爱德华·莫罗－西尔——还是老百姓时是哲学教授——站在那里，审视着一条1917年留下的战壕中的一切。我睡在离这战壕10米远的一个弹坑里。早晨5点来钟，突然间机枪和大炮齐鸣，向我们疯狂射击。我向莫罗－西尔靠拢。德国人唱着歌向我们走来。战斗在10点开始。司令部命令我们向莫尔多姆转移。那时天气很好。突击队停下来暂歇了一会儿，好像是为了向这灿烂的6月致敬，又好像美景可以使人忘掉不幸，可以使战争和流血消失。莫罗－西尔和我只要一伸手就可采摘到树林中长满一地的草莓。这时，一枚榴霰弹在我们头上方爆炸了。一块弹片击中了我的右侧，弹片如今还留在我的肩关节里。我被这突然袭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打昏了。莫罗—西尔膝盖受了伤。一名卫生兵——我记得他叫梅里诺——将我扶到连指挥所，并把我放在一个滚动的担架上，推着去寻找野战诊所。

我记得那时的场面色彩强烈。我躺在我那四轮车上，混杂在路上流亡的人群中，我们只得放慢前进的速度。老百姓携家带口奔逃，但不知到什么地方去。我这台临时运输工具在绚丽的阳光下摇摇摆摆地前进。我只有任其摆布。正在这时，出现了几架意大利飞机，用机枪向路人扫射。大家纷纷奔向路边低洼处，逃向田野。我的同伴无法把我带走，就把我放下，临走时对我说："别着急，我会回来的。"我躺在担架上，一动不动，两眼望天，看着飞机向路上俯冲，并发射出连珠般的弹雨。

警报解除后，我们又开始重新游荡。我们所到的地方都有伤兵。首先，人们把我带到埃斯纳·昂·阿尔戈纳。外科医生们在地下室里动手术，割臂截腿。我不能再耽搁了。于是我们重新上路，继续我们的长途跋涉。在维特尔这个所谓的卫生城，现在只剩下前线医生和他们的伤病员。其他人都逃光了。这里只有呻吟、痛苦的叫喊、血和脓的臭味。在火车站上，为伤员们编组了一趟列车。人们把我放进车厢。列车很晚才出发，速度很慢。德国人已包围了洛林。我们在兜圈子。最后，我住进孚日省的布鲁依尔医院。从6月14日以来，我没有得到任何治疗。

6月18日，德国人到达布鲁依尔。从那里，他们把我转到吕尼维尔医院，之后又将我送进附近的战俘营。在我住院期间，我得到该地区青年女子志愿护士们的照料。她们给我打了第一次抗破伤风针。我还记得她们之中的一位，名叫让娜·迪

勒，后来我又见过她，她已在洛林结了婚。我曾将我的照相机和我受伤前拍的一些底片托付给她。那是我的战友们和各种静物的照片，其中有被扔在树林中碎尸的照片。幸亏有让娜·迪勒的帮忙，我才能同外界通信息。我记得我曾经对她说："我要走，离开战俘营，我要逃跑。"另一位来自里尔的名叫波黎的战俘准备与我同行。但是，正当我们积极准备的时候，接到了要我们开赴德国的命令。于是，1940 年 9 月，我同难友们坐上运载牲口的闷罐车——能容下 8 匹马或 40 个人——向兹罔汉方向进发，最后抵达卡塞尔附近黑森州的 IXA 战俘营。

问：作为战俘前往德国是否真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呢？

答：战俘们那时以为他们会很快被释放，关押时间最多不会超过三个月。德国人是很好的心理学家，他们玩弄这一套，让战俘们觉得不必越狱逃跑。他们让我们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使我们相信和平协定很快就能签字，我们接着就会被遣返回家。最可靠的牢狱莫过于对明天的希望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这个牢狱已持续五年了。

在 IXA 战俘营，生活条件十分恶劣。3 万人被"扔"在黑森州的丘陵坡上，此情此景，可想而知。战俘营就像一座难民城市。开始时，盗贼横行。我们吃得很少。德国人并不野蛮，但是执行规定却毫不宽容，而且不管战俘内部的事情，在内部是团伙说了算。如能保存一件贵重物品——像手表、钢笔等，那是了不起的事。在每天一次分发食品时，团伙头头们先将大麦粥或芜菁汤大盆中的东西吃掉，剩下的才是我们的。在那些使用刀子的专家们的威胁下，抗议是无用的。往往是一大早，在我们睡的大帐篷里，可以看到陈放着几具尸体。尽管这样，一种比较公正的秩序终于建立起来了，一些大胆者从群众中站

出来，在大家的支持下，起来反对强权法则，建立起组织的雏形。暴力消失了。曾经实行暴力的人现在变成了可怜虫，被人瞧不起，蜷缩在一角，只有苦苦哀求才能得到自己那份食物。“匕首法则”奇怪地被以精确分配为基础的新法则取代了。我原来时常想到这种非凡的“社会炼金术”，它在战俘营里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使我们从弱肉强食时代进化到了文明社会。

问：作为世家子弟，遇到这种弱肉强食的情形，您不觉得这是一种冲击吗？

答：战前我是大学生，我同大学生生活在一起。战俘营的生活使我首次获得了介入社会争斗的真正经验。我认识了一些我们以前毫无所知的人，我发现了一些我所陌生的阶级的反应，我看到了我青年时代世界的解体。与此同时，在我眼底下创立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在战俘营，和平时期实行的等级制度，很快的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当人们看到过去的企业领导人、名教授、大资产者把头伸进垃圾桶里去舔那些沾有果酱或奶酪残渣的包装纸时，难道还会有别的办法吗？

战前的社会秩序一下子被废除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度自然也就建立起来了，它是以人的道德素质为基础的。我们可以证实这种素质的存在，因为它支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全部旧机构都取消了，我们穿着同样的制服，我们遵守着同样的作息时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晚上放工回来，直到熄灯之前，我们坐在床架上讨论问题，细心捉拿藏在衣缝里的虱子。第一次看到这些蠢蠢乱动的东西时，我实在难以忍受。我表现出极端的失落。后来我习惯了，正如习惯了露天厕所一样，那是一些大战壕，覆盖着残雪，底部有时会躺着一具死尸。我们光着上身高谈阔论，虱子在我们的指甲间劈啪作响，我们的思绪飘

CHINA

向未来，在那里用梦幻来补偿共同的苦难。我们谈论我们每天的生活、看守人的情绪、各种劳役的相对长处、食物（谈得很多）、女人（谈得很少）。我们盼望着星期天的土豆烧牛肉或土豆泥，以好美餐一顿。我们还期望那些已经被叙述者的想象所歪曲了的外部消息，那些使我们接近解放的政治或军事事件。我们经常谈到留在苦难中的法国，她的价值观和她机构的崩溃。我们并不以这来指责共和国，而是指责她的人和她的做法。对维希政府我们漠不关心，对伦敦的流亡政府我们不了解。我们的期望成了乌托邦：为什么我们那种人人平等的状况不能在战后连续下去呢？如果我们善于把已有的经验教训强加于人的话，为什么这种状况不会永久持续下去呢？

问：这种“乌托邦状态”有时被叫作是“战俘精神”，由于它必须以超凡入圣为条件，如同所有的假设的超凡入圣的危险一样，难道它不也是一种危险吗？

答：我们的社会是平均主义的，但又是专断的。我们穿着同样带补钉的或破破烂烂的衣服，我们喝着同样的汤。把贫困、平等、尊严理论化，就是一种天然的诱惑。它引导我们想象一个傅立叶式的世界，在那里，人们建立起法伦斯泰尔（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社会基层组织成员居住和工作的场所——译注）。总之，我们并不是那么的不幸。当时有一种危险，我的同志中的某些人陷了进去，而且至今还是这样：他们在铁丝网后面想象着将会有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理想社会。某些人一直陷在这种乌托邦里而不能自拔，后来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的社会党的同志中，都曾经遇到过这种人，他们总想象未来的社会能摆脱弊病和实力较量，取得对恶习、腐化和人类野心的免疫力。我没有走得那么远，但是我梦想过。在我越狱后，我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以这种精神状态迎来了1942年……

战俘营的精神，战俘营的博爱，战俘营的灵性，这些都存在过，但千万不要夸大。战俘营精神不仅仅是团结和忠诚，也有可能是“人人为己”，甚至会发生自己那份定量面包被最要好的朋友偷去的情况。俘虏们在严酷的现实中补偿过去的错误，但并没有奇迹般地转变为“十全十美”的阿尔比教徒。被俘期间每天都有“战争”，但对手不一定总是德国人。

总的来说，我们不是怀着自己属于一个几千人的集体这种感情而生活的。重要的是有许多由7个或8个人组成的小核心，同一核心内的人分享外面送来的邮包，分担劳役，并统一安排工作——以好节省每个人的体力。这是一种小团体现象，而不是“大家庭”现象。

问：即使您从来没有向某些俘虏的乌托邦偏向让步，但这种经历在您身上留下了久远的印记……

答：是的。这种经历使我深知，在困境或不幸中，人类价值的等次同我以往认识、尊重，至少是接受的价值等次是完全不相符合的。我从这个发现中产生了怀疑，也就是在被俘期间，我开始从根本上怀疑我赖以安身立命的那些准则。

问：您曾提到你们在捉虱子时的晚间谈话。在你们的话题里，您没有提到宗教问题，像上帝、灵魂不灭、天主教或各派教会等等，而你们全体或几乎全体都受过天主教的培养。

答：由于顾及面子或尊重他人，我们把这些话题留在白天其他时候再讨论。在我睡的房间里至少有6位神甫。12名波兰人是十分虔诚的教徒。很多人遵守天主教教规。但他们都极其谨慎，以免出现任何传播教义的热忱。一种不成文的协议或公约使我们保持沉默，不去损害那种对我们起保护作用的氛

围。从我们的对话中排除政治争论。我们的小分队是由各色人等组成的。犹太教徒、新教徒、自由思想者都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们都是我们的同志。不管是谁，只要挑起无谓的争论，都会受到责备。话虽是这么说，还是出现了一种以天主教教义为中心的令人惊讶的精神再生。弥撒集合了数百名忠实信徒，听忏悔的神甫、甚至一般的“知心人”都深受欢迎。他们对德国人的坚定态度，赢得了那些对前途失望者的信任，后者失去了原有的参照物就本能地转向了传统。战俘营中的音乐家和诗人们用一种真正的天才谱曲、写诗、朗诵，他们的作品常常带有神秘主义的灵感。我现在还记得那时听过的一些诗句和旋律。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感动了我。至于我自己，当时一直都很矛盾的：一方面，我怀念过去受过的教育，以及童年时代的执着；另一方面，我对生和死的荒谬、丑和美的混杂进行沉思，因为这些问题使一切信心都模糊不清了。在我的周围，宗教信仰和实践之风重新深入人心，而我的灵魂却远离了宗教。我还需长时间地观察和寻找，直到有机会睁开双眼去看这个疯狂的世界为止，造物主认为让我们居住在这个世界是做了好事。

问：您被关押在哪个战俘营呢？

答：最先是在 IXA 战俘营，在卡塞尔西南部。随后于 1940 年 10 月转到离鲁道夫施塔特不远的图林根的 IXC 战俘营。在这个地方，我被编入由 250 人左右组成的小分队，我的小分队编号为 1515，驻扎在沙拉村里。这是一个非常混杂的班组，集合了一些被奇怪地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中间有西班牙的共和党难民、法国军队中的志愿兵、犹太人、神甫、小学教师等等。

我对这个充满博爱精神的沙拉小分队保留着美好的记忆。

尤其是与我同一房间的战俘们，我们之间相处融洽。在这里，我看到了法国在饮食和法权方面的天赋。呵！当我们把从田里偷偷的偷来的土豆，蘸上皮鞋油在取暖的平底锅上烧烤的时候……

耶稣教会成员阿尔方斯·德洛布尔是我一生中很珍贵的朋友，他那时以高超的技艺主管这类事情。有时，我们的菜谱会因从农舍偷来的一只鸭子或从谁家屋檐下取下的一块肥肉而丰盛起来，德洛布尔不需要求助于神学的精神便能巧妙地烹饪我们的赃物，并且与大家一起吃得津津有味。他是上卢瓦尔省的一个农民，出生在离朱尔·罗曼村不远的地方。他的故事就像是热尔凡尼翁版《善良人》的回音那样。少年时代，他一直同一些棕色的母牛睡在牛栏里，靠母牛的体温来取暖。后来进入了神学院，那是当地家里人口多而又贫穷的孩子的自然出路。他天性善良，天资聪慧。人们觉得他疏远了放松要求、变得自满自足的天主教。他专心的信奉耶稣和新约的教义，那是一种朴素的信仰、朴素的爱。他自问，为何天主教神文要把生、死、痛、病这些明显的东西弄得那么复杂。他说，只要爱就足够了。因此他爱着。这位耶稣会教士属于里昂省。他以天主教诚笃神甫的身分行事，但对既定教会的存在方式表示不满。他那深沉而不可更改的信仰不需任何证明。他不是鼓吹它，而是在体验它。晚年，脑充血使他丧失了说话能力，但他仍然目光炯炯，洞察世事。在辞世前夕他还向我微笑。

法律家方面，有克利蒙—费朗的公证人让·伯纳斯，他善于耍手腕、施诡计，在1940年10月就让我们通过了“沙拉前战俘协会”的章程！对章程条文的谈判十分艰苦，耗费了我们整整一个季度的时间。我们使出了钻牛角尖的本事，最后总算

省了选举协会机构的程序。

问：您指的是一个贝当俱乐部吗？

答：不！与它毫无关系！你鬼迷心窍了！谁也没有打算成立这样的俱乐部，而且我本人就曾坚决反对这样的俱乐部。

问：人们指责您曾经受到过他们的诱惑……

答："人们"是谁？又是一个恶意中伤！贝当俱乐部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影响。他们在战俘营中组织一些小型集会，邀请不是会员的出席，我认为这样做是不正常的，而且是滑稽可笑的。当你是战俘时，你是不会参加由看守们支持的示威游行的。在各地战俘营中共有将近150万战俘，他们自然敌视把他们继续关押的人。因此，大部分人对甄别留用的企图无法接受。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问：可是，您的朋友让·韦德里纳却是属于这些贝当俱乐部中的一个……

答：我不知道。我们不在同一个战俘营。我是后来才认识他的。

问：您的小分队在沙拉被分派过何种劳役？

答：一些相当艰苦的劳役。我们经常处在带枪流动哨兵的监视之下。我们被派去养护道路或打扫卫生。我主要是在一个捆绑干草和稻草的工厂工作。这是个小工厂，离我们住的陶器厂几公里。那个陶器厂是一个便于看守的所在。窗户都拉上了铁丝网，四处都是栏杆。我们被监禁着，但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并不那么不舒服。我在那里结下的友谊始终是我最重要和最持久的友谊之一。德洛布尔、米尼埃、韦尔梅伊、菲尼特、勒克莱尔、夏尔维、莫尼埃、瓦雷恩、伯纳斯等名字使我一生信赖。那些同你命运与共的人，他们经受考验而保持着相互尊重

的崇高品质。不需要成文的公约，不需要口头的承诺，因为人们应该这样生活。所以，信任别人是可能的。

问：您在沙拉当战俘时是24岁，那时您想些什么呢？

答：我想逃跑，从第一天起我就是这样想。我在吕尼维尔曾试图逃跑，但由于突然开赴德国而未能实施这一计划。这几乎是一个朝思暮想的念头。我有一个个人理由：战争使我离开了我热恋着的姑娘。但这种解释是不足以说服人的。我无法忍受被那些盲目的力量所胁迫。把我的命运绑在一场战争的偶然性上，在整个战争期间我将一事无成，这种状况触犯了我内心深处的一个意向：始终应有一扇门向着未可逆转的命运敞开。我自我培养了某种个人冒险的浪漫主义。我觉得失去自由就像是遭受肉体上的痛苦。是的，这既是肉体的痛苦也是灵魂的痛苦。我曾在哪个地方写过，这不是勇气问题。我认识一些朋友，他们具有世间少见的勇敢，但从未想过逃跑。有人天生如此，有人则否。我是天生就是这样的。这是否是想重新拿起武器呢？是要参加为法兰西复仇的雄心吗？或许，由于我这一代人当时并非负责人，因此没有必要证明自己同一个国家几世纪来最严重的灾难之一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地方。但是，应当去哪里，怎样去，同谁去，我当时说不上来。

我并不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作为一个受欺侮民族的公民而生活的。法兰西的历史使我着魔，我热爱她的英雄人物、她的盛大事件和那些来源于她而震动世界的伟大思想。从童年开始，我就相信我将续写这部历史。我还觉到，对我国的占领就像是一场强奸。我不需要把自己同法兰西历史的强盛时代——黎塞留、马扎兰、沃邦、国民公会或波拿巴的时代挂起钩来。我个人就对一座由人类智慧与立体法则创造的如此和谐的奇妙建筑

被摧毁、被蹂躏、被包围而感到痛心。另外，我注意到，对我来说，法兰西最有代表性的天才就是沃邦。他只想着加强其根茎，紧闭其出口，拯救这块方形的牧场，这种方形牧场早已在菲利浦·奥古斯特或夏尔五世的思想中就由神秘的先知勾画出来了。

问：无聊是不是也是促使您试图出走的原因呢？

答：不是。我在任何地方都从未感到过无聊。你会觉得这种说法是古怪的。但是，我确实很顺应我的命运。我不是唯一的一个就这样的人。已往养成的习惯使许多人不想越狱。我不愿与我的同志们分离。我迅速地习惯了人们安置我的地方。我无意再换地方。逃跑的想法和逃跑的需要来自另外一些冲动。甚至今天我也无法确切地告诉你是哪些冲动。我觉得，自由就像人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我需要呼吸。我当时失去了法兰西，而离开了她，我就可能窒息。

从戴高乐时代起，人们就对他下述著名的格言展开了辩论："我对法兰西向来就有某种观念。"关于这种说法，我现在都感到陌生。对于法兰西我没有观念，而有感觉，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给人的感觉，包括她的体形、她的目光。她并不虚悬在天与地之间。她是一个具有三维尺度的人。我找不到能用什么同她相比。无论怎样，不能用某一种观念。她是围绕着四条大河和若干山脉建立起来的，甚至没有名副其实的边界。她是土地、水流、几何学的产儿，然后才给人以和谐的形象。这是欧洲唯一称得上大自然杰作的国家，而非人类雄心与想象力的果实。侵害这均衡奇迹就是伤害我，使我震惊。这并不是因为我对法兰西的爱首先出自审美感觉，而是因为，一个像德国那样不成体统的民族居然能侵占她、吞并她，在我看来是亵渎

神明：这些人在我家里会干出什么事来呢？他们说话的腔调比他们战车的轰响更使我难受，看看他们那种对一个世界上最古老民族颐指气使的方式吧！而他们的历史还不到二百年，……要我这一代人去经受这种考验，对我来说是不可忍受的。我们不是因为这而生的，我们在热爱自由中长大，而现在却只听到仇恨的腔调——一种虚构的、从蒙昧主义的血腥冒险中获得的优越感的表现。

谈到这里，人们应该已经明白，在我的思想中，地理的分量与历史的分量一样重。我把它作为一种参照物。我的爱国主义从拉德罗纳、拉夏朗德或拉维埃讷的源泉中所汲取的营养与从迪盖斯克伦的闪光思想中汲取的一样多。讲到我的国家，这首先是指风景，就像谈到我的爱人、我的朋友，首先是指他们的面貌一样。也许我当时曾有过分占有的倾向。这种倾向来自我幸福的童年。那时，凡事都顺我心。每棵树都有一个名字：柳树、白蜡树、橡树、椴树。我的河流之水来自土地，来自我的土地，那是我的土地。要不是因为疏忽或叛卖，它是难以被攻占的。我认为，青青的草地和它那些最不引人注目的小花——伞形花、山菊花、三叶草，都是不可谈判、不可转让的。麦收的香气属于我的鼻子和我的肺。田野和道路的灰尘是从我们的路上扬起的。河流的蜿蜒曲折只经由一个国家——我的祖国。威悉河两岸的居民与此毫无关系。同样贴近、伸手可及的是对于两次战争的回忆。那是反对同一个敌人的战争，是我一生的战争，是我所经历的世纪的战争，两次战争同样疯狂、野蛮、不可调和，但每次战争都提供了不同的模式。我们该走怎样的路呢？是 1914 年 8 月法国蓝衫军开往柏林的路吗？或是像 1940 年那样把世界搅浑去寻找我们的梦想呢？对法兰西的

CHINA

某种观念把我带回到那个已不可触摸的、犹如草叶般干枯的祖国。我更多地求助了《灵感山岗》一书的力量，反复吟诵它那奇妙的节律，好让过去的喧闹声在我身上回响。我一再重复巴雷斯所说的："这些地方的力量从何而来，希望应归功于对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归功于一个特殊景点的美丽，归功于那些世世代代来到这里活动的民众的激情，他们的品德更为神秘。他们的品德先于他们的荣誉，并将在荣誉消失后继续存在下去。他们不要怀疑这一点：在这世界上还有无数的精神据点，我们同那些毫无崇高可言的阴暗灵魂不一样。只有漫不经心或过度弱视的眼睛才不能把火同火棘区别开来。"

至于我的火棘不必想象得很远。它们就在那里，我也在那里，那是我刚回国的时候，在一个我一无所知或根本上是一个一无所知的地方，它的形象首次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刚刚渡过了卢河，附近有一些高地：阿尔莱、萨都—夏隆、图卢兹—勒—萨都。它们可能是尚未被神示而灵魂正在期待着的数千个精神据点中的几处。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我在一篇回国后不久所写的文章中作了反映。没有必要重新写过。我喜欢直播节目。那些印象是无法再创造的。我无意间把它"陈化"了半个世纪。它带着过去时代的印记和我感官疲乏的印记。下面就是我那时即兴而写的文字，原题为《在通往法兰西的道路上》（发表于 1943 年 4 月——译注）。

"那天早晨，法国天气晴朗。太阳驱散了轻雾，中午时分，阳光仍未照进峡谷。只剩下最后一段路了，到接待中心还要走 8 公里路，我感到前些日子的疲劳减轻了。鸟儿在飞翔，有时掠地而过，然后停下来，仰起脑袋；一条喘着粗气的狗在道路两旁辨认那不定的踪迹。田野肥沃而空旷，在冬天的气息下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